

古人金榜题名后的文化仪式

古代学子在金榜题名之后,有三项文化活动极具仪式感,这就是曲江流饮、雁塔题名和跨马游街。

杏园初宴曲江头

《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举人既及第……又有曲江会、题名席。”曲江位于西安市东南,为我国久负盛名的皇家园林,兴起于秦汉,繁盛于隋唐,尤其是在唐朝,引终南山之水,扩充水面千亩,建有芙蓉园、杏园、紫云楼、汉武泉、青龙寺、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诸多景观,楼台亭阁绵延不绝,是唐朝京城最为风雅之所。曲江宴本是朝廷为安慰落第举人所设,而到了唐中宗时,改为赐新科进士曲江游宴。进士们尽情游乐,开怀畅饮,赋诗抒怀。他们将酒杯放在盘子上,让其在曲流之上随水漂转,转至谁眼前,谁就执杯一饮而尽,遂成一时盛事。因此名曰“曲江流饮”。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在进士科放榜后的曲江宴上,来自山东的进士刘沧,因其屡举进士不第,曾漫游齐鲁、吴越、荆楚、巴蜀等地,遍访高人名士,丰富自己的学问才识,及第时已是白发苍苍,他因此兴奋异常,也很惹人注目。在如此风光的曲江宴上,刘沧感慨万千,一时文思泉涌,写下了科举史上有名的诗篇《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描述了进士及第后在曲江宴游庆典活动的盛况。

在曲江流饮中有一款樱桃宴颇负盛名。唐朝科举一般在春天发榜,此时正是樱桃上市的季节,民间有用樱桃“荐新”习俗。樱桃宴不仅与时令相符,而且樱桃被称为“初春第一果”,号称“百果第一枝”,其兆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之寓意。据五代学者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唐僖宗时,曾任宰相的刘鄩被遣出京任淮南节度使。乾符四年(877),其次子刘覃考中进士,刘覃安排管家给刘覃一铤(50两)银子,供他与同榜进士凑钱聚饮之用。而刘覃仗着自家财大气粗,要独自承办樱桃宴,派人预购了数十石樱桃。此时樱桃刚刚成熟,即使是达官贵人也还没有吃到,而刘覃的宴席上却堆积如山,同时又辅以糖和乳酪,每人都能享用到,连随从人员都沾光吃到了樱桃。

宋代因宴设在汴京皇家花园琼林苑,故称为“琼林宴”。王安石曾作《九日赐宴琼林苑作》:“金明驰道柳参天,投老重来听管弦。饱食太官还惜日,夕阳临水意茫然。”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20岁中状元,他在《御赐琼林宴恭和诗》中描写了琼林宴的盛况:“奉诏新弹人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蜺鸾间。献诗陈雅惠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元、明、清三代,因设宴地点不在琼林苑,故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但是宴会的流程和仪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琼林宴”。

元代赐恩荣宴于翰林院,元代诗人萨都刺《赐恩荣宴》诗曰:“内侍传宣下玉京,四方多士被恩荣。官花压帽金牌重,舞妓当筵翠袖轻。银瓮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赐御厨羹。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

明朝设恩荣宴于礼部,明代诗人施槃有《恩荣宴诗》曰:“千里观光我独行,辞亲无奈惜离情。玉堂未拟登三辅,金



《琼林登第》图局部

榜先叨第一名。麟凤骖鸾欣道泰,车书混一仰文明。太平天子恩如海,虎啸龙吟会匪轻。”

清朝沿袭明朝制,恩荣宴一般是在传胪次日举行,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宴会地点为礼部大堂。皇帝虽不会亲自参宴,但会钦派一名内大臣出席。另有读卷大臣、奎卫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等官员出席。朝中大臣与新科进士们觥筹交错,饮酒赏景,畅谈未来,其乐融融。

慈恩塔下题名处

李肇《国史补》记载:“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名”,又称“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又一荣誉仪式。

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张昌进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流饮后,与好友乘兴登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昌”六个大字。张昌此举竟引起轰动效应,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自发地来到大雁塔题名,成为唐时风尚。也有说起源于唐神龙年间。

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于新科进士题名赋诗,也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题名佳话。

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会后,蜂拥而至慈恩寺题名阁,他们先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以记盛事。然后交与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石砖上。这些人中日后若有做到卿相者,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

《太平广记》记载,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上,是由谈元茂执笔书写的。当时他们谦逊都不

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而写在押缝的板子上,游人一般也看不见,或者用不多久板子也便损坏。

在雁塔题名者中,最有名的要数白居易了。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与同榜进士曲江饮宴后,游览大雁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表现了他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心情。

据《新唐书》记载,曾任宰相的李德裕是以门荫入仕,所以对进士很是厌恶,背上奏唐武宗:“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于是将大雁塔以前题名的进士字迹全部刮去。直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雁塔题名又恢复如故。由于每科进士都要到雁塔题名,而慈恩寺的墙壁毕竟空间有限,不久,白墙便成“花墙”。唐宋诗人徐夬《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 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槐空映九衢,每看华字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鸾凤岂巢荆棘树,虬龙多蛰帝王都。谁知远客思归梦,夜夜无船自过湖。”

北宋神宗年间一场大火毁掉了这些珍贵的题壁,大雁塔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咸宁县对大雁塔进行重大修缮,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外表完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便是如今看到的大雁塔。明清时期,长安虽已不是国都,但当地的人文士追慕唐代雁塔题名的韵事,在每次乡试结束后,考中的举人都要相携登塔,题诗留名。清末民初国学大师金松岑有诗云:“唐家科第贵,进士门楣光。放榜集慈恩,名题雁塔旁。走马长安街,宴临曲江江。”

佳人争看状元红

唐人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所描写的

骑马,指的是进士们骑马列队从大街上游行经过,而非状元跨马游街。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起源于宋朝。宋朝在沿袭唐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

据《宋史·蔡齐传》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出了一道殿试题《置器赋》,让参加殿试的士子们论何为国之器。宋真宗阅卷时,蔡齐的答卷文笔优美,论述严谨,吸引了真宗皇帝,他尤其对文中“安天下于覆盂,其工可大”的语句大为赞赏,对身边的宰相寇准说:“得人矣,有安天下之意,此宰相器也。”说完,真宗宣名列前三四名者上殿。他见蔡齐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对答从容不迫,举止端重优雅,甚是喜爱,当即钦点为状元。

宋真宗实在是太兴奋了,赏赐蔡齐御马一匹,供其乘用,并诏令禁军首领派7名皇官侍卫,专门为蔡齐在汴京跨马游街清道传呼,以表示对蔡齐的恩宠。蔡齐意气风发,头插双翅,身着锦袍,由大内高手开道护卫,跨马游行于汴京御街之上。沿途百姓纷纷涌上街头观看,尤其是一些大家闺秀听说这名新科状元才貌双全,也跑出来远远观望,一饱眼福。科举状元“跨马游街”,蔡齐是获此殊荣第一人,为后世效仿。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后来延伸到全体及第进士,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根据当时的规定,状元、榜眼、探花三个人可以从正门出宫,而其余上榜的进士却只能从侧门出宫。在游街的时候,状元走在最前面,等到游街结束后,其他的进士要先将状元、榜眼、探花送回会馆,然后才能各自离去。

明代画家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琼林登第》图记录的是隆庆二年(1568)32岁的徐显卿金榜题名后跨马游街和赴琼林宴的热闹情景。图中徐显卿身穿进士服(深蓝罗衣,深青缘边,圆领大袖),头上戴着进士巾(与乌纱帽形制相近,左右展角,阔一寸余,长五寸余,垂有皂纱飘带,一对簪花,附有一对扶金银牌“恩荣宴”),手执用槐木制作的笏板。骑着一匹白马,踌躇满志,兴高采烈,两个黑衣皂隶为其牵马。前面一队仪仗,举着旌旗,抬着“进士及第”匾牌,吹奏着乐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画面的右侧为沿街院落,女子们有的掩门,有的在墙内登高观看热闹的场景,投去艳羡的目光。画面的左上方一童子牵着一头毛驴,一个落第的举子(或正在准备应试的举子),投去的目光很复杂,或自惭形秽,或嫉妒,或羡慕,立志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光耀门庭。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对应这四级考试考中者分别为生员、举人、贡士和进士。在四级考试中殿试为最高一级考试,由皇帝“亲策于廷”。阅卷完成后,皇帝升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首先由内赞官传呼登第进士名次,而后鸣赞官接传。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被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殿试进士名次以黄纸书写,故称金榜。传胪大典后大金榜张挂于东长安门外,礼部堂官率状元及诸进士随出观榜,从金銮殿到长安左门,要经过太和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到大清门。而后顺天府备伞盖仪从护送状元归第,状元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春风得意很是风光。

(《天津日报》,作者为贾传静)

世间万象 空中芭蕾



近日,2023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继续在长春市举行,“天之翼”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上演了一场空中芭蕾。

消暑有方



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生活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酷酷”趴在冰块上消暑。

蓝天碧水



近日,航拍苏州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蓝天碧水,湖光山色,呈现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梦幻漫游



近日,在广西百色德保县吉星岩,沿山路向下,好似开启“地心漫游记”,造型奇特的钟乳石与地下河相互衬托,如梦如幻,有的似仙桃树,有的似严寒月宫。

紫色织毯



近日,新疆昭苏县2000亩香紫苏迎来盛花期,无边的香紫苏花犹如紫色的织毯,伸展在一望无垠的昭苏大草原。

音乐喷泉



近日,浙江杭州西湖音乐喷泉重新亮相,新的展演包含《梁祝》《七蛟龙》《鸿雁》,以及杭州亚运会推广歌曲《爱达未来》四首曲目。(本报综合)

中国植物学先驱的璀璨人生

北京西郊,国家植物园樱桃沟。在这幽静的一隅坐落着一座亭子,名为“水杉亭”。亭旁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古体长诗《水杉歌》,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这首诗的作者就是一手创建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胡先骕,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西新建人。1912年,胡先骕被江西省官派至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他看到西方科学发达,深感只有发展科学,推动实业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其间他还结识了怀揣同样理想的留美中国学生秉志、任鸿隽等人,并于1915年加入了刚刚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1916年胡先骕学成回国,后来二次赴美并于1925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胡先骕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胡先骕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植物学家。他是第一个命名植物新属(秤锤树属)和新科(鞘柄木科)的中国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中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的植物谱系,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植物研究打下了基础。1948年,他与

郑万钧鉴定命名了被学界认为灭绝已久的“活化石”水杉,轰动世界。而水杉叶子现已成为国家植物园标志的一部分。

而比个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胡先骕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创建了中国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发起了中国植物学会、庐山森林植物园(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此外,他还创办了好几个生物学专业期刊、编写了3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亲手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使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很快登上世界舞台。胡先骕还修订了几代中学植物学教科书,使得植物学知识成为中国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科学救国”的初心。

胡先骕之所以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在于他敬畏科学,怀揣一丝不苟、求

真务实的态度。2016年,卢开运著,胡先骕审校的《高等植物分类学》修订稿在旧书市场上被发现。全稿388页,胡先骕的批注修改多达700余处、删节120处、提出疑问15处、修改图注8处。然而后来在为此书作序时,他仅褒奖作者“用力甚勤”,未提及自己的校改勘误。

学贯中西 文理兼通

在建立耀眼光辉科学成就的同时,胡先骕还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这也是他与同时代科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清末民初时,面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明的碰撞,胡先骕这一代青年人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是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革新;另一类是以胡先骕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价值,应该通过改良使之与现代社会和科学相适应。1921年,胡先骕与刘伯明、吴宓、梅光迪创办了《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形成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衡派”思潮。胡先骕这个时期撰写的一批文学批评文章,一改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现